

〔俄〕屠格涅夫著

前
夜
父与子



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

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

前 夜
父 与 子

〔俄〕屠格涅夫 著

丽 尼 巴 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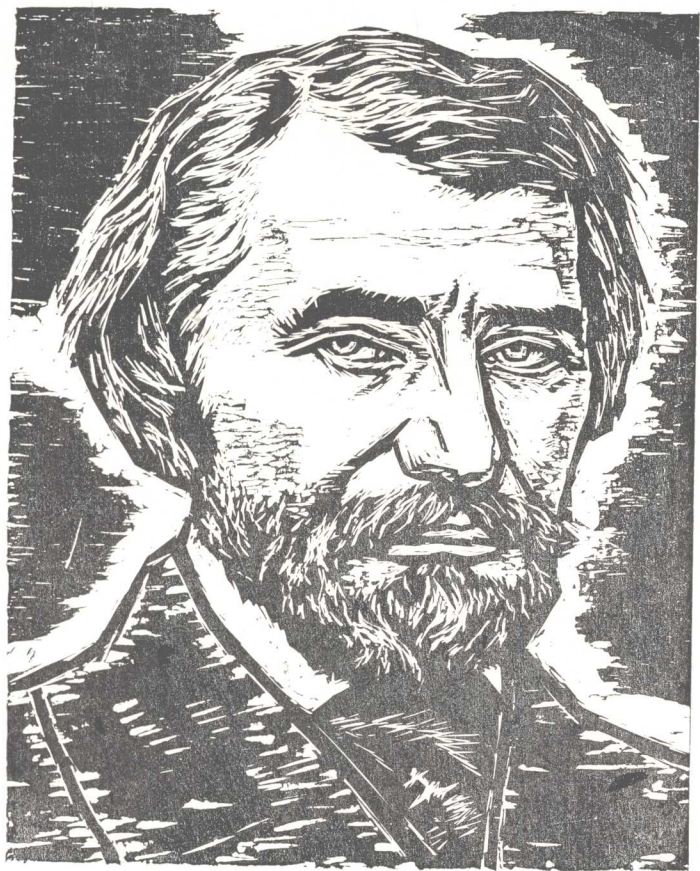
前夜 父与子
Qianye Fu Yu Z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33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8}$ 插页3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189,501—239,500

ISBN 7-02-000345-1/l·346 定价 5.75 元



作者像

译 本 序

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象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踞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①;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茁壮和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用列宁的话来说,当时“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②。与这个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代替他们,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正好是当时历史的纪录。他以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进入文学之林,接着他以《罗亭》宣告了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的人”的判决,又以《贵族之家》唱出了贵族阶级“黄金时代”消逝的挽歌。在这以后,社会上在等待着,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说将以什么人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

① 二十年代苏联有些研究者否认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者,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说他作为艺术家的力量在于抒情,而其抒情主题则是“爱情,人世的悲哀……”。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8页。

夫不负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由新的活动家来推动的历史趋向。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与子》(1861)。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说，两者可算是他创作中的双璧。

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是屠格涅夫的创作原则。他从不“从观念出发”来“创造形象”，总要有“活人来做依据”，但又不是依样葫芦，而是把生活“升华为诗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运动规律”，透过“偶然性的变幻”捉摸到时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罗夫的原型，是一个姓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爱国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一个少女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后来他们一度回到俄国，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①。屠格涅夫从友人那里得到关于他的记载，敏锐地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寻的主人公”，自己在构思中的那个“对自由怀着蒙眛而又强烈的渴望的叶琳娜愿意为之委身的主人公”^②。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当他在俄国生活中看到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的时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③。《父与子》里巴扎罗夫的原型是某县医生德米特利耶夫。屠格涅夫一次在旅行中与他邂逅，深深为他的锋利独到的见解而吃惊，从这里敏锐地感觉到那时“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④，抓住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性。他心中孕育着这个形象，并不断地概括“巴扎罗夫们”以及所熟

① 这里根据《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有关的考证。屠格涅夫自己在为一八八〇年版的长篇小说集的《前言》中谈到这件事，但比较简略。

②、④ 分别见《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第306页，第14卷第97页。

③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8卷第323页。

悉的贵族友人的品性，终于创造出“父”与“子”的典型，反映了当时两种历史力量的斗争。可以说，凝视当前现实的现象，深入了解其底蕴，敏捷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艺术地加以反映：这一切正是屠格涅夫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主要原因。

凡是伟大的作家，正如列宁说的，总是要表现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这当然不排斥他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消极因素及由此产生的消极作用。屠格涅夫也是这样。他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思想立场的矛盾，使他的创作成为复杂的文学现象。

这里我们想谈谈《前夜》和《父与子》写作时期的他的思想状况。屠格涅夫属于贵族自由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演变以及这位作家的思想特点，仍有待于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贵族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四十年代刚出现时尚有其进步的意义。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灭农奴制问题上，他们同民主主义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性。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国”“睁开眼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斯塔索夫语），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感到改革的必要，农民起义的浪潮也日益高涨。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宽书刊的审查。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时舆论的大胆曾使刚从流放回来的谢德林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说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压统治下，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政府还抱着对抗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围中，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却渐渐趋向同政府妥协了。面对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他们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自由主义者虽然也同

意分配土地，却要收取大量赎金；他们害怕革命，拥护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其欺骗性质暴露以后，两派“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①，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而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变成一种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力量了。这个历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创作的转折点。

一般说来，屠格涅夫的思想演变同自由主义者可说是亦步亦趋的。但是正象个性不能完全包括于共性一样，屠格涅夫也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由主义者。而且作为作家，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地方。的确，屠格涅夫象有人指出的那样，具有启蒙者的某些特点。例如，“强烈仇视”农奴制，“热烈拥护”全盘欧化，“衷心相信”农奴制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并“促进这一事业”^②。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温和的启蒙者”，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③，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双重性。一方面，在他看来，农奴“应该享有人权”（加里宁语），他同情农奴制下农奴备受欺压的无权地位，揭露压迫农奴的贵族地主、包括自由主义者（从《猎人笔记》到《前夜》、《父与子》）；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谈到改革前夜需要的英雄人物时，特地注明“不是指的人民”^④，他认为革命的因素不存在于人民身上，而“只存在于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之中”^⑤。一方面，他“真诚地”希望农奴制改革，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看到贵族地主在“表面上情愿（改革）的后面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

② 参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7页。

③ 屠格涅夫在致拉姆别尔特的信中，说自己“任何时候也不为人民而写作”。（见《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5卷第120页）。

④、⑤ 分别见《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8卷第368页；第5卷第49页。

隐蔽着极度顽固——既恐怖又吝啬”，他庆幸农奴制改革“不会后退”^①，他忧心忡忡，唯恐贵族农奴主阻挠改革，希望通过科学和文学唤起俄国进步力量支持政府实现这个“皇上的高尚意图”^②；另一方面，他畏惧农民革命，深恐“革命发生，全部贵族都将被绞死”，认为“我们不应通过这条道路前进”^③。思想立场上的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刊物《现代人》的彻底决裂。

《前夜》和《父与子》正好写成于作家思想创作转折的前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思想矛盾的折射。一般认为，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但这也只是因为他的矛盾的思想中积极因素占了上风。作为作家，屠格涅夫不同于他的文学界自由主义的友人德鲁日宁、安宁科夫、包特金等人。他们都受过别林斯基的熏陶。德鲁日宁等人在五十年代，早就成为纯艺术的鼓吹者；而屠格涅夫，特别在创作中，仍然基本上遵循别林斯基的遗教，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固然，在一八六二年以后，屠格涅夫也有过唯美主义的倾向（如《够了》和《幻影》），也公开诽谤过革命民主主义者（如《烟》），但他的立场是动摇的、矛盾的。他始终没有陷入反动阵营，也没有象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列斯科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卷入“反虚无主义小说”的逆流。

如果说，评价作家的立场，不能离开他的作品，那么，分析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应着眼于艺术形象。

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前夜》写道：“他（屠格涅夫）意识到，

①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3卷第181页。

② 《屠格涅夫全集》，第15卷第235—237页。

③ 转引自 C. 彼特罗夫著《屠格涅夫》，1961年，第351—352页。

以前的英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就决定放弃他们，从某些片断现象中抓住生活新要求的发展趋势，试行站上今天进步运动所循以实现的道路上。”^①小说的布局正好体现“以前的英雄”为“新人”所代替的过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舒宾和伯尔森涅夫。舒宾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机智而乐观。但是他玩世不恭，沉湎于个人的幸福。对于艺术他也只是随兴之所至，当作玩乐，而不愿下苦功夫。与他不同，伯尔森涅夫严肃，好学，锲而不舍。他不为世俗的乐趣而动心，热烈追求学术上的成就。他常常感到个人幸福同责任感的矛盾，但他善良，他可以为了责任而牺牲个人的幸福。不过，伯尔森涅夫也只是不能高飞的燕雀，他的可怜的理想无非是当一名教授，他脱离生活而遁入古代文化。饶有意思的是，在《前夜》初稿中，他谈到过“人民”、“真理”等字眼，在定稿时作家都给删掉了。

在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人曾醉心于艺术，而在四十年代则曾迷恋于学术。舒宾和伯尔森涅夫所向往的正好一个是纯艺术，一个是纯学术。他们作为五十年代的贵族优秀人物，已经没有他们前辈罗亭那样追求崇高理想的激情了。他们不是农奴制改革“前夜”所需要的。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是英沙罗夫。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富商的儿子，他的祖国被土耳其人占领，父母都遭土耳其人杀害。他立誓要洗雪国耻家仇，内心燃烧着为解放祖国而献身的激情的火焰。他坚强果断，沉着寡言，讲究实际，言行一致。他目标明确，心不旁鹜。他外表羸弱，却蕴藏

^① 引自《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见《杜勃罗留波夫文集》，第6卷第105页。下文提到的他的话均引自这篇文章。

着勇士般的力量。他将整个身心献给祖国解放事业，准备为此牺牲一切，包括爱情，如果它妨碍他的事业的话。他能团结同胞，并在他们中间享有信任和威信。如果说舒宾恣纵感情而猎逐幸福，伯尔森涅夫遵循理智而有强烈责任感，那么对英沙罗夫说来，个人追求和社会责任是和谐一致的。这是社会地位使然，他的国耻家仇是连结在一起的。

《前夜》反映的是改革的“前夜”。社会必须改革，这个问题深深激动着屠格涅夫。改革有赖于“自觉的英雄性格”^①。他清醒地看到，在贵族中，即使是优秀分子，也不能肩任这样的历史任务。要寻找“新人”。这种“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八年曾在文章中提到，他们在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虽然还是罕见现象，其代表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屠格涅夫从生活中得到启示，就以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活动家作为文学的主人公，明确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向，并在俄国文学史上打开崭新的一页。这是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不朽成就。但是这种成就不仅仅由于他的艺术敏感，而主要由于他的“艺术上的自我否定”，他“强迫自己的审美感，迁就于固执的……高尚的心灵倾向”，而使贵族的优秀代表在精神上为英沙罗夫所战胜。^②

可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人，目标是解放祖国，他要与之斗争的是外部的敌人，是土耳其占领者。而当时俄国社会，象杜勃罗留波夫说的，需要的是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的是内部的敌人，即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和专制农

①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8卷第368页。

② 这是当时一个否定《前夜》的批评家说的话，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7页。

奴制度。因此可以说，英沙罗夫同当时俄国的需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也不是屠格涅夫艺术上的失算，而是由于他的思想立场的限制。屠格涅夫以人道主义来反对农奴制，他只渴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他所隐忧的不是这种改革的有名无实，而是贵族顽固派的阻挠改革，因而认为，俄国需要团结有教养阶级一切进步力量同农奴制斗争，而人民则只能跟随前进，这就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团结包括“最贫苦的农民和乞丐在内”的“保加利亚人”以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这也就是幻想以民族解放代替社会革命，以各阶级的联合来代替农奴反农奴主的斗争。不仅如此。对于英沙罗夫，他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推崇他的高尚和爱国主义，却不完全同情他的革命理想和行动。他把英沙罗夫看作堂吉诃德^①，也就是虽然忠于理想，但却是徒劳无补的。因此，不仅没有表现英沙罗夫的行动，使其在那“恋爱应当让位给公民活动的地方”就中断了生命；而且通过舒宾所塑造的两个英沙罗夫塑像，表明作家自己对他又爱又憎的两种感情。正因如此，作家不能渗透到这个人物的心灵：英沙罗夫做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以致这个艺术形象的轮廓有点模糊。

从形象丰满来说，应推女主人公叶琳娜。她是中心人物，不仅情节围绕她而展开，所有人物的优缺点也由她来衡量——“自觉的英雄性格”就是通过她来选择的。她有性格形成的历史。父亲是空虚的却不严厉的自由主义者，使她能养成自由的性格；母亲多愁善感，因丈夫不忠实长期感到压抑，又孕育了叶琳娜同情

^① 屠格涅夫的《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一文发表于《前夜》之后几个月，但开始写作于一八五六年。在这两个作品发表后不久，有人就认为英沙罗夫体现了屠格涅夫所理解的堂吉诃德的精神。

心的幼芽。但这种同情心主要还是由社会培养出来的。她常常梦见贫苦的人，正象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中“一切优秀事物不都是在这一类印象中成长和得到锻炼的吗”？她渴望积极的行动，不仅做好人，还要做好事。她单独成长，习惯于冷静分析，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庸俗无聊的家庭，使她感到孤独和苦闷。她早就憧憬冲出这个无形的樊笼，缺乏的只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理想人物给她指明道路。舒宾虽有才华却华而不实，伯尔森涅夫虽然渊博却目光短浅，更不用说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虽然干练而讲实际，但却那么庸俗！她所倾心的只能是英沙罗夫那样既有崇高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解放自己的祖国！”她从这句“伟大”的话里看到自己所探求的理想的体现。屠格涅夫以描写少女著称，而叶琳娜则是他笔下最完美的形象。要知道他的少女形象是以理想见胜，但是娜达莎（《罗亭》）或丽莎（《贵族之家》）所憧憬的却只有理想的形式，而叶琳娜的理想才获得具体的内容。英沙罗夫象磁石那样吸引了她，她多年潜伏的感情象春潮那样奔涌出来。通过日记作家缕述了她的隐秘的心理活动，让她弄清了自己的情感。她果敢坚决，主动地三次访问了英沙罗夫。社会的舆论只配受她蔑视，家庭父母是她早要挣脱的羁绊，英沙罗夫要回祖国，等待着他们的是贫困、艰险和屈辱……这些丝毫也不能阻挠她前进。她爱上他就无保留地把自己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可以说，到此为止，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完整的。而下文却稍稍有了变化。“欢乐极兮哀情多”！在他们结合后，作品的情节急转直下。但是，作家似乎不忍他们这么匆匆地喝完了人生的苦杯，给他们安排了威尼斯之行。在这水都，作家以其诗意盎然的抒情笔触抒写了他们甜蜜的可却是昙花一现的幸福，马上又以神秘的悲观主义的语调暗示了他们不幸的未

来。“我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我们凡人，可怜的罪人”……面对上帝、大自然而感到软弱无力，这给叶琳娜的形象蒙上不协调的色彩；须知她不同于丽莎，没有宗教的情绪。但叶琳娜仍然是坚定的，她忠于爱情，矢志不移。在英沙罗夫病故以后，还到保加利亚去当起义者的志愿看护，“忠于他的终生事业”。

应该指出，叶琳娜的形象，不是作家的杜撰，而是时代的典型。在她身上，洋溢着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形成前夜的社会气氛，表达了当时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概括了当时前赴塞瓦斯托波尔担任志愿看护的贵族妇女的忘我精神；而她同贵族环境的脱离又反映了俄国进步青年的转向民主力量。屠格涅夫从这些现实基础出发，使其同改革的“前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形象更为充实，更有意义。但是，叶琳娜在威尼斯突然袭来的哀愁的预感，她的相信宿命论和怀疑自己幸福的权利等等，不是来自形象发展的逻辑，而是作家所素有的悲观哲学的表现。这种悲观哲学不仅象有人认为是由于作家“对他周围现实的不满”，而且是没有前途的阶级的思想的反映。而在这里，还表现了作家对妇女解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的怀疑。

叶琳娜和英沙罗夫两形象是交相辉映的。他们的爱情的基础是崇高的理想，远远超出了男女之爱。不过，叶琳娜的理想是有赖于英沙罗夫而得到明确化并付之行动的。因此只有英沙罗夫才是当时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英雄。这就是为什么杜勃罗留波夫寄希望于他，说随着叶琳娜的出现，俄国的英沙罗夫也很快出现了。

小说引起了当时两个阵营的不同反响。上流社会攻击叶琳娜形象轻浮、“不知羞耻”，“体现了破坏因素”，并主要因作品的“政治主题”而加以根本否定，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虚假和错误

的”，有人还讥笑说，这个“前夜”“任何时候也不会有明天”。屠格涅夫因此几乎要“付之一炬”^①。而在另一阵营那里，杜勃罗留波夫在他写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里，却很欢迎英沙罗夫和叶琳娜形象。他只是惋惜英沙罗夫不是俄国人，固然他知道这是由于俄国的政治条件妨碍这种人物发展。但却仍然认为，俄国要有自己的英沙罗夫，并且他也行将出现了。“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作出的是革命的结论，暗示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并且必须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这是屠格涅夫所害怕而不能接受的。他从审查官那里看到此文的手稿后，强烈要求《现代人》不刊登它。但后者没有听从他而把文章发表出来。他同《现代人》杂志社在农民解放问题上久已分歧，这件事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误会，促使了彼此间的最后决裂。屠格涅夫多年以来作品都给《现代人》发表，而《前夜》和后来的《父与子》，在写作过程中就预定交给《俄国通报》。这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刊物，从六十年代初起，代表反动的农奴主利益，同《现代人》激烈论战。为这个刊物撰稿，是屠格涅夫思想立场重要变化的表现。

《父与子》写于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前后。身经激烈的思想斗争，作家的头脑更清醒了。各阶级协调一致的幻想已经消散，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两个阵营间的鸿沟终于展现在眼前。这也就是“父”与“子”的冲突的社会内容。

小说一开始，屠格涅夫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环

^① 这些意见分别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0页，505页，524页。

境里，使他的性格以至作品的冲突迅速地展开。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祖父种过地”，他的一双红色的手说明他自幼劳动过。他同阿尔卡狄是彼得堡大学的同学，现在到后者的贵族庄园里度暑假。在科学、艺术、哲学、道德……以至社会制度和一般的原则等问题上他和巴威尔都有正相对立的想法。很快就争论开了，但这是对方挑起的，他却为此打呵欠，觉得无聊。他不是热中于宣传的罗亭，他重视的是实际行动，现在则是做科学实验。他冷静、自信，在论争中只用简单几句话，准确有力地击败对方，又能不动声色，不象巴威尔那样失去自持。这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从高处俯视对手，显示出他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后来决斗的场面里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对一切持批判态度。当巴威尔问他：是否“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有……”的时候，他沉着地肯定说：“一切”，以致巴威尔说：“说得可怕”。由于审查制度，屠格涅夫不能说得更清楚些，但却已经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了。当然，虚无主义的价值是相对的，视所否定的对象而定。巴扎罗夫否定专制农奴制度，因此这否定是含有积极意义的。他也不光是否定，尤其不是为否定而否定。他破坏一切，只是因为首先得“把地面打扫干净”。也就是说，他破坏是为了建设，这破坏也是建设性的。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破坏本身还不就是建设。巴扎罗夫说：建设，“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可见他没有积极的纲领。^① 因此，作为虚无主义者，他并没有象作家说

① 在《父与子》初稿中，巴扎罗夫曾对奥津左娃谈到：“必须从消灭一切旧事物开始”。要烧掉“无用的宿草”，“如果土壤里力量没有消耗完了，它就会使其双倍地成长”（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458页）。这是巴扎罗夫唯一的有建设性的话，屠格涅夫后来把它删掉了。

的那样，就意味着是“革命家”^①。他只是过渡的典型。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论争就没有政治意义了。上面说过，巴威尔因对方否定一切而感到可怕。他另一次又问：巴扎罗夫是否也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这无疑暗示着国家、财产、法律以至教会等等。巴扎罗夫不直接回答而反问道：这是“在审问吗”？巴威尔的脸色不禁为之变白，因为其中含有政治的潜台词。这场斗争已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它是当时社会上两个阵营斗争的鲜明反映。在基尔沙诺夫庄园里两个阵营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是巴扎罗夫，还有家仆和农民孩子们，巴扎罗夫以民主态度赢得他们的喜爱；这里也包括费涅奇卡，她喜欢他平易近人，并因他在“吵架”中把巴威尔“弄得团团转”而悄悄高兴。另一方面则是巴威尔兄弟、卜罗科菲奇以至阿尔卡狄。

的确，巴扎罗夫是被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来描写的。他的一些观点，例如反对僵死的“原则”；否定责任感和内心追求的矛盾；批评人民的消极面；认为人与人“就象一座林子里的树木”彼此相似；认为精神上的病来自不健全的社会，随社会的改造而消失等等，都可以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里找到类似的表述。另一些观点固然概括自别的人，例如只相信感觉而不相信理论概括，来自庸俗唯物论者；否定普希金以至整个艺术，来自民主主义作家尼·乌斯宾斯基^②；而这两者又都接近皮萨烈夫的观点。不过，屠格涅夫客观地反映这些观点，却并不完全赞成。最明显的如他在书简中谈到，尼·乌斯宾斯基否定普希金几乎是“发了疯”^③，他显然是抱着反感把这些

①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0页。

②、③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182页。